

# 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

都 阳 蔡 昉 屈小博 程 杰

**内容提要:**由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在促进了城镇化的同时,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综合利用多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库,实证分析了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和提高城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对资本产出比和工作时间有负面影响,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净收益非常可观。根据本研究的回归结果,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在未来几年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收益。这也就意味着,在推进全面户籍制度改革中仅仅考量户籍制度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而忽略其带来的巨大收益,可能会在实践中制约改革的进程。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 全要素生产率 中等收入陷阱

## 一、导 言

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成就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标准,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离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也并不遥远。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以2005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水平,在2010年已经达到6804美元。以2010年至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推算,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已经达到8626美元(购买力平价、2005年不变价)。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年均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水平将达到13000美元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然而,这看似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任务,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道路上,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而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增长停滞的国家却屡见不鲜。一项针对100多个国家的跨国研究表明,“增长停滞”发生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概率要高于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Aiyar et al., 2013)。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命题的重要原因。而Barro(2012)发现,成功实现赶超的经济体,在经历了20至30年的高速增长期之后,基本上都跨越了当时的高收入门槛。如果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那么已经实现了30年高速增长奇迹的中国可能正处于十字路口。

中等收入阶段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多事之秋,是因为在该阶段的后期,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必须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性变化。Imbs & Wacziarg(2003)观察到,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结构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程度又逐步提高。从推动增长的源泉看,两个阶段也有明显差异,前者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积累实现,而后者则必须依赖经济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显然,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增长面临更多的困难。

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发展形势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主要是因为以前促成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些有利因素正逐渐消失。在二元经济时代,由于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很低,劳动力

\* 都阳、蔡昉、屈小博、程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28,电子信箱:duyang@cass.org.cn。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市场转折对中国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挑战及政策应对”(批准号:71173234)、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的资助。文责自负。

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就可以带来配置效率的改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然而,随着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工资的趋同,由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已由改革开放头20年的每年20%—25%(世界银行,1998;蔡昉等,1999)下降到2007—2012年的每年约10%(都阳,2014)。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阶段,由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Aiyar et al., 2013),而中国的增长路径似乎正逐渐偏离这一轨迹(Wu et al., 2014)。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则越来越紧迫(Du & Yang, 2014),一旦失去经济效率的支持,中国经济将面临要素积累推动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的巨大挑战。

在这种局面下,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已成共识。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其中重要的方面。一直以来,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大多着眼于户籍改革的成本多寡。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包括的内容、财政承受能力、中央和地方的义务等成为考量的重点。实际上,我们还应看到,如果把户籍制度看作是人口登记、就业管理和社会保护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对其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必将进一步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刺激劳动力的流动与供给,创造出新的制度红利,并由此继续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本文所指的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正指触及户籍体系核心内容的改革举措,即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其最终消除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让户籍回归其人口管理的原始功能的改革方案。对户籍制度如何改、改什么的讨论已经很多,本文将不再赘述。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如果户籍制度得到及时、全面、彻底的改革,劳动力进一步流动,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收益。而我们希望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可以更加坚定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心。

## 二、移民与生产率

户籍制度鲜见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多在工业化阶段就已经实现了国内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过,迁移与生产率关系的案例仍可见于跨国的人口流动,如美国的移民以及欧盟各国之间的人口流动等。较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移民的流入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尤其是移民对本地居民的影响,如移民是否会损害本地居民的工作机会,是否会压低流入地的工资水平等。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开放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移民的流入并没有损害本地人的就业机会以及压低市场工资水平(Borjas, 1994)。这意味着,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使用效率也可能提升。新近的研究开始关注迁移与加总经济绩效的关系,尤其是对技术选择(Lewis, 2005)和生产率的影响(Peri, 2009)。

在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之前,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前述的人口跨国流动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进入的移民并没有完全享受本地居民的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因此,我们沿用Peri(2009)分析美国各州移民对州生产率影响时使用的理论框架,讨论外来劳动力对所流入城市生产率的影响。

城市*i*在*t*年使用如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生产出地区增加值 $Y_{it}$ :

$$Y_{it} = K_{it}^{\alpha} (X_{it} A_{it} \phi(s_{it}))^{1-\alpha} \quad (1)$$

其中, $K_{it}$ 为城市*i*在*t*年的加总资本存量, $X_{it}$ 为总工作时间, $A_{it}$ 为全要素生产率, $\phi(s_{it})$ 为技能密集指数(index of skill intensity),可以用如下方程来表达:

$$\phi(s_{it}) = [(\beta_{it} s_{it})^{\frac{\sigma-1}{\sigma}} + ((1-\beta_{it})(1-s_{it}))^{\frac{\sigma-1}{\sigma}}]^{\frac{\sigma}{\sigma-1}} \quad (2)$$

$s_{it} = S_{it}/X_{it}$ 是总劳动时间中接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工作时间的比重,在本研究中我们定义为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占比。相应地, $1-s_{it}$ 就是高中及以下的劳动力工作时间的比重。 $\beta_{it}$ 反映生产率的技能偏向程度。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率 $w_{it}^h$ 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率 $w_{it}^l$ 之比

应该等于其劳动边际生产率之比,即:

$$\frac{w_{it}^s}{w_{it}^l} = \left( \frac{\beta_{it}}{1 - \beta_{it}} \right)^{\frac{\sigma-1}{\sigma}} \left( \frac{s_{it}}{1 - s_{it}} \right)^{-\frac{1}{\sigma}} \quad (3)$$

根据(3)式可以计算出 $\beta$ ,如下式:

$$\beta_{it} = \frac{(w_{it}^s)^{\frac{\sigma}{\sigma-1}} s_{it}^{\frac{1}{\sigma-1}}}{(w_{it}^s)^{\frac{\sigma}{\sigma-1}} s_{it}^{\frac{1}{\sigma-1}} + (w_{it}^l)^{\frac{\sigma}{\sigma-1}} (1 - s_{it})^{\frac{1}{\sigma-1}}} \quad (4)$$

为了进一步观察产出变化的来源,将(1)式以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的形式重新表达如(5)式,其中, $y_{it} = Y_{it}/L_{it}$ , $L_{it}$ 为总就业, $x_{it} = X_{it}/L_{it}$ 为劳均工作时间, $K_{it}/Y_{it}$ 为资本产出比。

$$y_{it} = (K_{it}/Y_{it})^{\frac{\alpha}{1-\alpha}} [x_{it} A_{it} \phi(s_{it})] \quad (5)$$

对(5)式两边都取对数,以“ $\wedge$ ”表示随时间的百分比变化,则总产出随时间变化的百分比可以表示为:

$$\hat{Y}_{it} = \hat{L}_{it} + \hat{y}_{it} = \hat{L}_{it} + \left( \frac{\alpha}{1 - \alpha} \right) \frac{\hat{K}_{it}}{Y_{it}} + \hat{A}_{it} + \hat{x}_{it} + \hat{\phi}_{it} \quad (6)$$

上式表明,总产出的变化来源于两个部分: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变化 $\hat{L}_{it}$ ,以及劳均产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hat{y}_{it}$ 。其中,劳均产出的变化又来源于以下四个部分:(1)以资本产出比 $K_{it}/Y_{it}$ 反映的资本密集程度;(2)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hat{A}_{it}$ ;(3)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化 $\hat{x}_{it}$ ;(4)以单位劳动生产率加权的技术密集指数 $\hat{\phi}_{it}$ 的变化。

显然,对于一个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体而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可以扩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规模。以前的经验数据也表明,城市新增就业主要来源是农民工。同样,我们也希望观察劳动力迁移对人均产出的几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三、数据、模型及估计结果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劳动力转移对城市经济发展,尤其是生产率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主要分析手段是观察迁移劳动力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规模以及劳均产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

#### (一)数据

城市是我们的基本分析单位。由于中国城市具有“城市级别”这样特殊的治理结构,需要仔细定义“城市”的范围。例如,在行政区划上,地级城市或更高级别的城市往往下辖县级市。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市辖区”的口径,因此,没有包括城市所辖县及县级市。由于县级市的部分指标难以获得,我们只分析地级以上城市。

#### 1. 产出与资本存量

产出与资本存量的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产出”即市辖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根据省级“地区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得到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资本存量”根据各城市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按永续盘存法估算。我们按照以下步骤估算城市水平的资本存量。

首先,确定基期的资本存量 $K_{i0}$ 。根据永续盘存法,如果基期年份选择越早,基期资本存量估计的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会越小。本研究关注的是地级城市市辖区,目前最早可追溯到1990年,因此选择这一年份为基期,部分城市的数据缺失,我们以可追溯的最早年份为该城市的基期。此外,还需要确定基期的资本产出比( $K/Y$ )。基期资本存量一般采用假设的资本产出比( $K/Y$ )倒推得到,早期研究(如Chow, 1993)假定1952年左右的资本产出比在2.5—3.0之间,相关学者

也较多采用这一假定,按照王小鲁(2000)的估算结果, $K/Y$ 基本保持在2.0左右,张军、章元(2003)估算结果达到3.0以上,但上世纪90年代前后呈现下降趋势。综合相关学者研究,考虑到本研究确定的基期年份距离当前较近,我们确定2.0作为基期年份的资本产出比,以此推算基期的资本存量。

其次,确定折旧率 $\delta_t$ 。相关学者一般将中国固定资产的折旧率确定为5%—10%之间,如Perkins(1988)和王小鲁(2000)假定为5%,Young(2003)假定为6%,刘明兴(2002)和龚六堂等(2004)假定为10%,单豪杰(2008)假定为10.96%,张军等(2004)解释了永续盘存法中折旧率 $\delta_t$ 的理论含义,采用法定残值率代替资本品的相对效率,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并考虑三类资产存在的明显寿命差异,分别按照各自的寿命期计算折旧率然后加权平均,得到各省的折旧率为9.6%。本文参照张军等(2004)的估算结果,将9.6%作为折旧率参数。

第三,确定投资水平。大部分研究采用了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但是统计部门只核算并公布了全国和省级层面的数据,地级城市层面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本研究选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衡量当年投资 $I_{it}$ 的指标。

在确立了上述几个主要参数及变量以后,我们根据 $K_{it} = I_{it} + K_{it-1}(1 - \delta_t)$ 计算相应年份各城市的资本存量。

## 2. 迁移与就业

迁移劳动力对(6)式右边各个部分的影响,是本研究着重关注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各个城市的迁移劳动力进行准确的定义和度量。我们将“本市以外户籍,在本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劳动力”定义为迁入劳动力。数据来源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的微观数据。上述微观数据还包含了就业以及其他反映个人特征的信息,因此,可以加总出城市总体就业水平、迁移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等。两次调查还提供了周工作时间的信息,使我们得以计算 $X_{it}$ 及 $x_{it}$ 。根据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可以计算各个城市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劳动力与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在总工作时间中所占的比重,即 $s_{it}$ 和 $1 - s_{it}$ 。

## 3. 工资与技能密集指数

反映技术偏向程度的技能密集指数 $\phi_{it}$ 根据(2)式和(4)式计算而得。由于需要知道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作为生产率的权重,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并没有工资信息,所以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计算了2005年和2010年各个城市高中以上劳动力和高中及以下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 $w_{it}^h$ 和 $w_{it}^l$ ,并以此计算技能密集指数 $\phi_{it}$ 。

## 4. 参数 $\sigma$ 和 $\alpha$

在计算技能密集指数 $\phi_{it}$ 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A_{it}$ 时,需要确定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替代弹性 $\sigma$ 。根据Ciccone & Peri(2006)的综述,长期看该替代弹性值在1.5和2.0之间,因此Peri(2009)在其估计中,将替代弹性 $\sigma$ 的参数值确定为均值1.75。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刘易斯模式向新古典模式的转变。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得到充分发挥之前,上述替代弹性的值可能低于对于发达国家的估计。都阳(2013)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至少从短期看,替代弹性值要小于针对成熟经济体的研究结果。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使用1.75作为基准的估计参数,并观察当使用1.5和1.25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参数 $\alpha$ 实际上反映了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重要性。结合多项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我们将该参数值确定为0.68。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2005 年(a)	2010 年(b)	变化(b-a)
GDP(亿元,1990 年价格)	220(440)	408(794)	188
就业(万人)	71.34(95.24)	94.53(146.91)	23.19
劳均产出 (万元,1990 年价格)	3.35(1.75)	4.32(1.93)	0.97
移民就业份额(%)	27.2(23.4)	35.5(24.3)	8.3
周劳均工作小时(小时)	47.8(3.64)	46.4(2.62)	-1.4
外来劳动力(小时)	52.3(4.63)	49.7(3.05)	-2.6
本地劳动力(小时)	46.1(3.07)	44.7(2.38)	-1.4
资本产出比	1.65(0.46)	2.12(0.62)	0.47
劳均产出(元/小时)	17.33(8.75)	23.20(10.24)	5.87
TFP(元/小时)	5.94(9.39)	3.82(6.60)	-2.12
$\phi$	1.143(0.05)	1.153(0.05)	0.01
$\beta$	0.277(0.177)	0.325(0.175)	0.048
S(%)	16.3(8.4)	19.2(8.3)	2.9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本研究所整理的数据库计算。

$$\hat{b}_i = \gamma + \eta_b \Delta L_i^m / L_i + \varepsilon_i \quad (7)$$

上式中,左边的变量  $b_i$  分别为总就业水平  $L$ 、资本产出比  $K/Y$ 、全要素生产率  $A$ 、平均工作时间  $x$  以及技能密集指数  $\phi$ 。

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关系,使用 OLS 回归会导致我们估计的弹性有偏。为此,我们选择了工具变量,对(7)式使用 2SLS 估计方法。工具变量包括如下两类:前期已经安置下的移民占就业的比重以及城市到最近的交通枢纽的铁路里程。交通枢纽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

### (三)估计结果

表 2 主要回归结果

	OLS		2SLS	
	基本设定	滞后被解释变量	基本设定	滞后被解释变量
就业	1.08(0.033)***	1.10(0.034)***	0.837(0.098)***	0.994(0.077)***
劳均产出	-0.525(0.054)***	-0.34(0.05)***	-1.00(0.167)***	-0.493(0.306)**
劳均产出的构成				
资本产出比	-0.153(0.038)***	-0.201(0.037)***	-0.731(0.141)***	-0.759(0.136)***
TFP	-0.138(0.099)***	-0.077(1.06)	0.598(0.291)***	0.906(0.39)***
工作时间	-0.027(0.066)	0.026(0.057)	-0.061(0.018)***	-0.043(0.018)***
技术密集指数	.0003(.005)	-0.036(0.047)	-0.0088(0.014)	-0.0026(0.012)
技术密集指数的构成				
$\beta$	-0.383(0.158)	-0.355(0.370)	-1.225(0.443)***	0.139(0.352)
S	-0.011(0.064)	-0.033(0.055)	-0.412(0.183)***	0.207(0.581)
观察值数	251	251	251	251

注:表中第一列为被解释变量,所报告结果为对  $\Delta L_i^m / L_i$  的回归结果。所有的回归方程都按照 2010 年城市的就业规模加权。\*\*\*、\*\*、\*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1 列示了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以及其在两个不同时间点的变化情况。

### (二)估计模型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对产出水平和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路径。因此,主要的解释变量是  $\Delta L_i^m / L_i$ ,即由于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引起的就业变化占总就业的比重。类似于 Peri(2009)的经验回归分析模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估计以下一组方程,来观察相应的弹性值  $\eta_b$ :

表2列出了主要的回归结果。如前所述,我们需要观察主要的解释变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引起的就业变化占总就业的比重” $\Delta L_i^m/L_i$ ,对劳动力市场规模(就业)和劳均产出的影响,根据(6)式,对劳均产出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对资本产出比、TFP、工作时间以及技术密集指数的影响,而技术密集指数又主要涉及两个参数 $\beta$ 和 $S$ 。表2中每一行是上述变量之一对我们感兴趣的解释变量 $\Delta L_i^m/L_i$ 回归的结果,每一列反映了设定的变化。表2每一个单元格报告了(7)式中的弹性 $\eta_b$ 。我们在下一节将着重分析这些弹性值的含义。

#### 四、户籍改革可以获得多少红利?

随着城乡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的主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2013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1.66亿,占城镇就业总量的43%。然而,在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但缺乏全面的户籍改革的条件下,人口流动是以劳动力流动为主。由于户籍改革的滞后,以劳动力流动主导的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扭曲,并制约经济发展。

由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以劳动力流动主导,在城市化水平刚刚过半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性,首先利用劳动力市场机会的总是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劳动力。因此,纯粹的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家庭及个人的禀赋,并使得劳动力流动模式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即只有人力资本水平和家庭禀赋条件达到临界水平的劳动力才可能利用劳动力市场(Du, et al., 2005)。当禀赋条件位于临界水平之上的劳动力转移殆尽的时候,尽管我们仍然能看到农业中有大量剩余人口,但刘易斯转折点仍然来临(蔡昉,2010)。

这种形式的城镇化扭曲了城乡的人口结构。由于30岁以下的农村人口迁移率很高,因此,农村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新的变化,所谓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日渐突出,并引发了教育、养老及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同样,以常住人口定义的城镇化率与以户籍人口定义的城镇化率的差距越来越大,2012年达到17.3个百分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 (一) 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

从现有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分布看,由于前述的选择性流动,剩余劳动力资源的数量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如图1所示。由于保留工资水平更高,40岁以上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转移的难度增加。2009年30岁至64岁的未转移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78亿,占全部未转移农村劳动力的84.5%。那么,这些劳动力是否可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进一步发挥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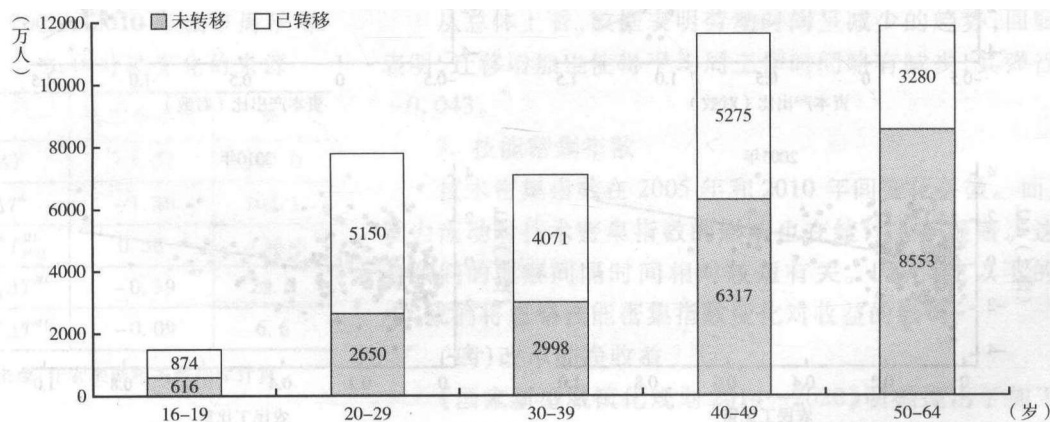


图1 2009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住户调查”微观资料推算。

首先,目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主要是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因此,低技能劳动力供应的增加,无疑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延续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其次,普通劳动力与城市现有的高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有助于强化高技能劳动力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经济效率。第三,其他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就业结构的变化往往呈现两极化趋势,低端岗位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也不断增长(Oldenski, 2012)。如此,城市劳动力市场将对4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产生持续的需求。

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很容易从回归结果发现,城市的就业规模已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流入的多寡,其弹性值高达0.99。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资本产出比不能无限制地提高,就业规模的扩大和TFP的增长几乎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全部。

## (二)提高TFP

Peri(2009)对美国各州的实证分析表明,外来移民(尽管他们大多属于低技能的群体)的增加,推动了本地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专业化程度,并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一半以上。另外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由于移民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岗位,使得其他劳动者的技能得以更有效率的配置。因此,移民的流入促使本地工人更多地配置于技能、知识密集的行业。所以,更高水平的专业化和竞争使移民流入成为提升经济效率的源泉。根据(1)式和(6)式,可以得到(8)式,并据此计算2005年和2010年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A_{it} = \left( \frac{Y_{it}^{\frac{1}{1-\sigma}} K_{it}^{-\frac{\sigma}{1-\sigma}}}{X_{it}} \right) \frac{(w_{it}^u)^{\frac{\sigma}{\sigma-1}} s_{it}^{\frac{1}{\sigma-1}} + (w_{it}^l)^{\frac{\sigma}{\sigma-1}} (1-s_{it})^{\frac{1}{\sigma-1}}}{[w_{it}^u s_{it} + w_{it}^l (1-s_{it})]^{\frac{\sigma}{\sigma-1}}} \quad (8)$$

表1已经展示了TFP水平在两年间的变化,从2005年到2010年,城市平均的TFP水平下降了36%。然而,这一时期TFP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非但没有得到转变,而且愈演愈烈。如表1所示,城市的平均资本产出比由2005年的1.65上升到2010年的2.12,提高了28%。而图2的上半部分显示,资本产出比与TFP水平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越是依赖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城市,其经济效率也越低。图2的下半部分展示了迁移与TFP的关系,即便在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也可以观察到劳动力市场越开放的城市,其经济效率也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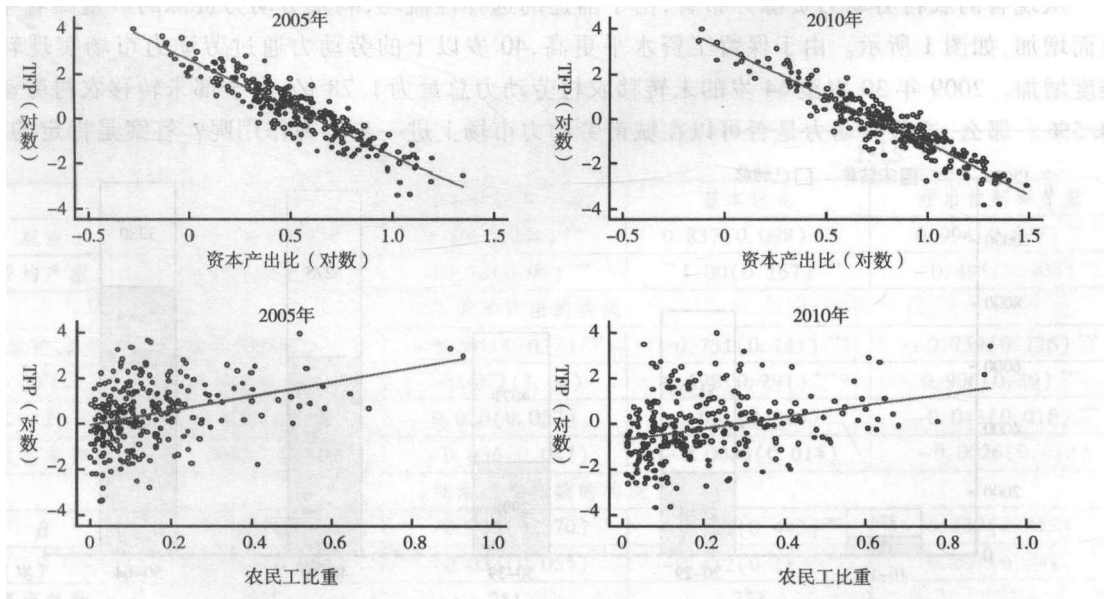


图2 TFP与资本产出比及移民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库计算。

表2中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就业中迁移劳动力数量的变化,的确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有积极影响。在控制TFP初始水平的情况下,其弹性值达到0.91,而且在统计上显著。

为了观察替代弹性 $\sigma$ 取值大小对TFP的影响,我们还给 $\sigma$ 分别赋值1.5、1.25以及0.5,以观察弹性值 $\eta$ 的变化情况。使用同样的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和设定, $\eta$ 值分别为0.99、0.75和0.18,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

### (三)资本产出比、工作时间与技能密集指数

根据新古典理论,从长期看,当经济增长达到稳态水平,劳均产出的增长仅仅取决于TFP的增长,而资本产出比、工作时间和技能密集指数都将保持不变,因而,不会对劳均产出的增长有贡献。然而,就处于结构调整前夜的中国经济而言,我们仍然可能观察到这些因素对劳均产出的影响。特别是我们观察了各个城市从2005年到2010年增长绩效的变化,其间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刺激计划,资本产出比也有显著提升。

#### 1. 资本产出比

如表1所示,资本产出比在我们观察的期间经历了显著的上升。但回归分析表明,外来劳动力的流入显著降低了资本产出比,其弹性值为-0.76,这一结果与Peri(2009)对美国各州移民的分析符号一致。鉴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过度依赖投资,资本产出比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从一定程度上说,资本产出比的下降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也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 2. 工作时间

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两部分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存在差别,总体上看,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化 $\Delta T$ ,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因素:本地工人工作时间的变化( $\Delta T^L$ ),迁移劳动力和本地工人工作时间的差异( $T_{2005}^{ML}$ )及其变化( $\Delta T^{ML}$ ),以及迁移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 $s_{2005}^M$ )及其变化( $\Delta s^M$ ),即:

$$\Delta T = \Delta T^L + \Delta s^M T_{2005}^{ML} + s_{2005}^M \Delta T^{ML} + \Delta s^M \Delta T^{ML} \quad (9)$$

较之2005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平均周工作时间下降了1.37小时。普查数据表明,无论是本地工人还是外来劳动力,工作时间都有所下降。根据(9)式,我们可以对变化来源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工作时间的下降主要来源于城市本地职工工作时间的减少,占102%;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工人工作时间差的缩小占28%;而外来劳动力占总就业比重的增加使得周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0.41小时,占30%。这意味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仅仅观察劳动力流动对平均工作时间的影响,将会发现其有利于平均工作时间的增加。

表3 2005—2010年城市周平均  
工作时间变化的来源

	周工作小时	%
$\Delta T$	-1.37	100.0
$\Delta T^L$	-1.40	102.1
$\Delta s^M T_{2005}^{ML}$	0.50	-36.8
$s_{2005}^M \Delta T^{ML}$	-0.39	28.0
$\Delta s^M \Delta T^{ML}$	-0.09	6.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库计算。

从总体上看,数据表明劳动时间呈减少的趋势,回归结果表明,迁移增加也使得平均周工作时间略有减少,其弹性值为-0.043。

#### 3. 技能密集指数

技术密集指数在2005年和2010年间变化甚微。而且,劳动力流动对技术密集指数的影响也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与我们的观察间隔时间相对较短有关。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技能密集指数变化对收益的影响。

#### (四)改革的净收益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了如下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0%,意味着有7.4%(约1亿)的人口由农村转



移到城市。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已经充分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户籍制度的全面改革。

以到2020年再转移1亿农村人口计算,平均每年的新增转移人口为1667万,考虑到新转移的农村人口构成将不再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我们假定其劳动参与率水平为2010年非农劳动参与率的平均水平65%(都阳、陆旸,2013)。根据本文估计的弹性值,我们可以推算,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上述目标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如表4所示,未来6年中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来的经济收益,每年各约为4至5个百分点。但由于人口的流动,资本产出比将下降,而劳均工作时间也会减少,并使得收益为负。关于技术密集指数的回归不显著,因此不考虑其影响。总体来看,人口流动的净收益为正,初期可以获得每年约2个百分点GDP的净收益,随后下降,到2020年仍然可以获得约1.6个百分点的净收益。即便假定未来几年的GDP增长速度下降到5.5%,每年的净收益(2013年价格)仍然超过1万亿元,如表4中最后一列所示。

表4 全面户籍改革的净收益

年份	劳动力市场规模(%)	TFP(%)	K/Y(%)	工作时间(%)	净收益(%)	净收益(亿元)
2014	5.56	5.06	-8.24	-0.24	2.14	12200
2015	5.26	4.80	-7.80	-0.23	2.03	12132
2016	5.00	4.56	-7.41	-0.22	1.93	12098
2017	4.76	4.34	-7.05	-0.21	1.84	12095
2018	4.54	4.14	-6.73	-0.20	1.75	12119
2019	4.34	3.96	-6.44	-0.19	1.68	12169
2020	4.16	3.79	-6.17	-0.18	1.61	12243

注: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确定迁移目标,经济增长率水平假定为5.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估算结果推算。

需要指出的是,以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基础所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健康。资本产出比下降和人均劳动时间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被劳动力更全面的利用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所抵消。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中国不仅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质量也由于摒弃了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式,而更加健康。

## 五、结 论

改革进入深水区,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当是改革攻坚的重要内容。然而,在以要素积累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深化改革与持续增长是兼容的。甚至唯有改革,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难题,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提供了城乡统筹发展、让更多人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机遇,而且所带来的增长潜力,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户籍制度改革所能带来的红利,以前往往为我们所忽视。本文综合利用多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库,考察了移民流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移民的流入是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并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升了经济效率,而后者将是中国在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虽然移民的增加对于资本产出比有负面影响,但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求日渐强烈的情况下,这一变化也与我们的改革目标相兼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未来几年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改革目标。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的工作思路。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是对

与户籍相联系的福利体系、公共服务的全面改革,为劳动力的进一步、充分流动创造条件。从改革方式上看,也需要超越以往地方试验、分类改革的形式,通过更系统的顶层设计,在不同类型城市和地区之间更全面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然而,让改革进程付诸实施所带来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希望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尽管所谓户籍改革的“成本”,实际上是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的人群,但仅仅把目光集中于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狭隘的,改革带来的收益才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

#### 参考文献

- 蔡昉,2010:《经济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1期。
- 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with 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 都阳,2013:《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反应:基于微观数据的观察》,《经济研究》第1期。
- 都阳,2014:《劳动力市场变化与经济增长新源泉》,《开放导报》第3期。
- 都阳、陆旸,2013:《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劳动供给形势与政策》,载于蔡昉主编:《2013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龚六堂、谢丹阳,2004:《我国省份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分析》,《经济研究》第1期。
- 刘明兴,2002:《1952—1999 年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论坛,研究报告。
- 单豪杰,2008:《中国资本存量 K 的再估算:1952—2006 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 世界银行,1998:《2020 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王小鲁、樊纲,2000:《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
-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第10期。
- 张军、章元,2003:《对中国资本存量 K 的再估计》,《经济研究》第7期。
- Aiyar, Shekhar, Romain Duval Damien, Puy Yiqun, Wu Longmei and Zhang, 2013, “Growth Slowdown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The IMF Working Paper.
- Barro, Robert, 2012, “Convergence and Modernization Revisited”, paper for Nobel Symposium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ockholm, September 3—5, 2012, Harvard University.
- Borjas, George, 1994,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2(4), 1667—1717, December.
- Borjas, George, 2006, “Native Internal Migr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Impact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1, No. 2: 221—258.
- Chow, Gregory, 1993,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No. 3: 809—842.
- Ciccone, Antonio, and Giovanni Peri, 2006, “Identifying Human-Capital Externalities: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73, No. 2: 381—412.
- Clemens, Michael, 2011, “Economics and Emigration-Trillion-Dollar Bills on the Sidewalk”,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 No. 3: 83—106.
- Du, Yang, Albert Park, and Sanggui Wang, 2005,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3 No. 4: 688—709.
- Du, Yang, and Cuifen Yang, 2014,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Labor Market Changes: Implication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Forthcoming.
- Imbs, J., and R. Wacziarg, 2003,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March), No. 1: 63—86.
- Lewis, Ethan, 2005, “Immigration, Skill Mix, and the Choice of Techniqu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Working Paper # 05—08, May.
- Oldenski, L., 2012, “Offshoring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 S. Labor Market”,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North Holland Press.
- Perkins, Dwight, 1988, “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No. 2: 601—645.
- Wu, Harry, Yang Du, and Fang Cai, 2014,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unpublished memo.
- Young, Alwyn, 2003,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 No. 6: 1220—1260.

Jha, Raghendra Tu Dang, and Yusuf Tashrifov, 2010,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Poverty in Tajikistan",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43:95—112.

Zhang, Y. , and G. Wan, 2008, "Can We Predict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Working Paper.

## Do Public Transfers Reduce Vulnerability?

Fan Liming and Xie 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ublic transfers on vulnerability. It makes use of two round panel household survey data. It adopts the 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 method for estimating vulnerability and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 wi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djustment in order to test the effect of public transfers on vulnerability. The main results are that even though the cross section data show a positive pattern in lowering poverty over time for china, panel data show the large amount of vulnerability that Chinese people are subject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becomes smaller along with rising poverty line. Education, household size, employment, work status and area have same effect on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simultaneously. Whatever the poverty line is, the impact of the public transfers has little impact on vulnerability of the transitory poor and the chronic poor.

**Key Words:** Public Transfers; Poverty; Vulnerability

**JEL Classification:** I38, H31, J38

(责任编辑:宏 亮)(校对:晓 鸥)

---

(上接第 13 页)

## Sustain the China Miracle: Reaping the Dividends from Hukou Reforms

Du Yang, Cai Fang, Qu Xiaobo and Cheng Ji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ASS)

**Abstract:** As a driver of urbanization, th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decad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further labor mobilit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using several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datase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urther migration would facilitate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labor market and enhance the TFP. Although it might b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atio of capital to output and working hours, the net benefits would be substantial. Comprehensive reforms on hukou system will benefit China significantly, which implies that, without recognition of the benefits, concerns about the costs hukou reforms entail could impede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s in practice.

**Key Words:** Hukou Reforms; TFP; Middle-Income Trap

**JEL Classification:** J68, O47, O11, O15

(责任编辑:松 木)(校对:张 涵)